

论整体性发展

□ 邱耕田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91

一、整体性发展是对“要素性发展”的超越

从实践进程来看,整体性发展是对要素性发展的扬弃和超越,这样,我们要深刻把握整体性发展的含义和意义,还应采用对比性的研究方法以对要素性发展的含义、表现、消极后果等问题进行分析,这不仅仅是由于要素性发展是整体性发展的对立面,更为关键的是要素性发展还是迄今相当盛行的一种具有片面性的发展模式。

在整体性发展和要素性发展之间,其实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只有处理好这种关系,才能有效推进整体性发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体性发展和要素性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分散独立的社会要素和处于整体关联状态中的社会要素,它们之间的地位、作用、运行状貌等都是明显不同的;进一步而言,要素性发展和具有关联性的整体性发展,它们之间的做法、运行状态及效果等都大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要素性发展具有鲜明的单一性或片面性和断代性的特点,它把注意力只集中于特定时空的具体的“点”和“时”上,因而呈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在,不见未来”的形而上学特性,并造成了社会要素或社会时空的分割、断裂和失衡、冲突,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出现和高代价发展的发生。而整体性发展具有非线性的协同联动性、多维共进性等优势。在整体性发展中,包括要素性发展,它主张要在确保或促进要素性发展的基础上追求整体性发展,即整体性发展不排斥要素性发展。更重要的是,整体性发展,一方面能克服要素性发展所产生而自身又无法克服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实现要素性发展所不具备的整体性效能,因而具有低代价性的整体性发展显然要优于具有高代价性的要素性发展。这样,实现由要素性发展向整体性发展的转型跃进,就成了当下发展实践的必然选择和急迫任务。

要素性发展和整体性发展之间不独具有差异性,它们之间还具有统一性或不可分性。一方面,要素性发展是整体性发展的基础和支撑。社会系统的诸多要素(也包括人的要素)及其发展是什么样的,整体性发展一般会是什么样的。离开了要素性发展,整体性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意味着,整体性发展当然要重视并关照要素性发展,不能为了整体的发展而无条件地、长期地、大面积地损害要素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整体性发展又制约着要素性发展。如果说静态的整体是要素或部分得以存在的不可缺少的系统性条件的话,那么动态的整体性发展同样是要素或部分持续性存在的不可缺少的系统条件。当我们说要素是系统或整体中的一分子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要素处于社会系统中的特定位置,并充当着社会系统的特定“角色”,发挥着特定的功能。既然社会要素处于社会系统的特定位置,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它就要接受社会系统的“洗礼”,并服从于和服务于整体性发展,使自己拥有社会系统或社会整体性所赋予的社会规定性。如果要素性发展在方向上出现了与整体性发展不一致的地方,那么整体及其发展往往会以其强大的管控力来矫正这种离异的现象,使其回到与整体及其发展相一致的轨道上来。这实际上是要素或部分在社会发展中被“系统化”或“整体化”的现象。

整体性发展对要素性发展的制约,还表现在纵向的时间维度方面——具体说是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上,具体而言,是历史的整体性对现实的整体性的影响,现实的整体性对未来的整体性的影响,以及未来作为一种潜在的整体性存在对当下的整体性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对现实、现实对未来的影响总是以整体性的面貌出现的,即这种影响包括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物的方面的影响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等等。

相对于要素性发展,我们提出并实施整体性发展,将会促成社会发展的两种重大转向:其一,发展

认识的转向。整体性发展范畴的提出,把我们以往对发展的参照基点由某一社会要素和某一发展阶段而转向了着重对要素和阶段间关系的认识上,即整体性发展的思想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认识方面,必须从“要素论”“眼前论”中走出来,转向于对发展的整体性的认识和参照。这样一种发展认识论方面的飞跃性变化,能使我们发展存在的认识,由“要素发展论”升迁到“整体发展论”的更高境界。其二,发展实践的转向。认识的转向必然伴随着实践的转向,即现实的发展实践,将由过去只重视发展要素和发展当下的做法,而转向既重视要素和当下,更重视它们之间关系的做法,这应当是发展实践领域具有深远意义的进步。

这两种转向特别是其中的发展实践转向,无疑是人类发展特别是我国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其一,这种转向丰富和扩展了社会发展范式。以前是要素性发展,现在则是整体性发展,这是人类发展范式的重大拓展和进步。其二,深化和细化了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具体途径。也就是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我国的科学发展,必须走整体性发展之路,否则,可持续发展包括科学发展将会流为空谈,难以取得实效。长期以来,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科学发展,之所以在推进的过程中,困难重重、问题多多,效果不大,关键在于我们是在“要素性发展”的框架内看待和实施它们的。现在,整体性发展模式为我们高效推进可持续发展包括科学发展开辟了新的更为理想的途径。其三,提出整体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原理的现实运用,它从发展实践的角度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和观点的正确性,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

当然,在整体发展观看来,要从长期盛行的要素性发展向整体性发展转变,必须坚持创新的理念和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整体性发展其实也是一种创新性发展,它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同源、同质、同构、同向性的统一关系。一方面,实施整体性发展离不开创新,或者说,创新性发展支撑和推动着整体性发展,它为整体性发展注入了强大而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整体性发展规定或规范着创新性发展,它使创新性发展有了一个着力点和落脚点,换言之,具有工具性、技术性功能的创新性发展要为整体性发展服务。总之,如同整体性发展与要素性发展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一样,整体性发展和创新性发展之间是具有同样的辩证关系。由于创新及其创新性发展之于整体性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在整体发展观的视阈中,我们就有必要阐述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统一关系。

二、整体性发展应当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导形态

整体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属性,它几乎涵盖了事物发展的一切性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整体性应当是发展的根本属性,也应当是中国发展的最高和最有价值的特性。整体性作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本质属性,是现阶段中国发展与以往传统发展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我们把握现阶段特别是未来中国发展走向的根本切入点。用整体发展观来考察当今中国的发展,可以获得如下两个方面的重要认识:第一,从本体论的视角看,整体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属性或根本属性,因为中国发展所要追求的人本性、创新性、协调性、绿色化或生态化趋势、开放性、共享性等都要从整体性中引申、衍生、阐释。第二,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整体性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方法,我们要从整体性视角来把握、分析、评价和解决发展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审视发展现实、解决发展问题、重塑发展未来,都需要一种整体视野,从而整体性的观念和实践方法成为我们从事发展实践的重要的方法论武器。

整体性发展要求确立整体性的思维理念。整体性的思维理念,表现为一种全局观或宏观思维,其核心内容是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这表明,整体性的思维理念其实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或者说,唯物辩证法成为我们如何实现整体性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整体性思维理念,在指导整体性发展的进程中,主要表现为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协商民主等的原则和要求。

1. 整体性发展与顶层设计

从整体性发展的角度看,顶层设计的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在于:其一,自上而下的特性。即顶层设计是一种总揽全局、高端谋划、宏观思考的做法,换言之,关于整体性发展的核心理念、预设目标、组织和发起的力量重心、制定规划和提出的要求等基本上都源自“顶层”。而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特性,既符合整体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高度吻合。其二,整体关联性。顶层设计的特性或意义不仅在于其所具有的顶层性或高端性,还在于其所具有的统筹考虑的整体关联性。有的发展即使如单一片面的发展也有顶层性或高端性,即是由政府强力发起和推动的。对整体性发展而言,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特性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其整体关联性,否则依然会陷入要素性发展的窠臼。如果说过去的要素性发展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那么,在今天的整体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加强具有宏观性、高端性、长远性和整体关联性的顶层设计,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有机统一起来,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进

程中,要考虑到不同领域、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平衡,避免出现那种单兵突进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和做法。其三,顶层设计意味着要强化和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多层次的发展主体中,政府主体特别是中央政府主体是最为关键的主体,它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发展起着核心的领导作用。所谓顶层设计,主要由中央政府组织实施。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且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国家,不同地区、群体、领域之间在发展中的张力始终存在并经常发挥着离散性作用,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管控,否则,非但实现不了整体性发展,可能连正常的发展都很困难。中央政府必须为中国的整体性发展当好“舵手”,当好“总设计师”,即要定好位、定好标、定好则等。

2. 整体性发展与统筹兼顾

如何推进整体性发展,做法可能很多,但主要的做法就是统筹兼顾。如果说,顶层设计主要具有谋划性、战略性的话,那么,统筹兼顾就主要具有实践性、操作性了。就其含义而言,“统筹”是指总揽全局,总体谋划,即要登高望远,从全局高度思考、研究、解决问题;“兼顾”就是要照顾各个方面、平衡各个环节、协调各种关系。统筹兼顾的这一方法论功能,恰恰是对事物的整体关联性的反映。换言之,整体性在方法论上必然表现为统筹兼顾的做法。

统筹兼顾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就体现着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方法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就以政策的系统性为例指出:“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季节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灵活性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隶属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当然,统筹兼顾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辩证法的两点论,就是面对复杂的事物,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关注次要矛盾;在面对任何一种矛盾时,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关注矛盾的次要方面。辩证法的“重点论”,就是在面对复杂事物时,要着重把握它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在面对任何一种矛盾时,要着重把握它的主要方面。不去把握这个重点甚至否认这个重点,而是平衡用力,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均衡论”。推进整体性发展的统筹兼顾的方法,正是对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具体运用。

3. 整体性发展与协商民主

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和实施整体性发展,必须采取一种适合整体性发展的民主形式,这种形式主要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当然是一个政治术语,但完全可以引入发展哲学的领域。从整体发展观的角度看,所谓协商民主,是指广大发展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的做法或方式,参与发展决策和发展管理。具体而言,在中国发展的特定视阈下,协商民主的特点表现为要以强化和维护中央政府的领导为前提,以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为内在要求,以发展管理中的对话和协商为手段,以达成和谐与共识为核心原则,以追求整体利益为目标。

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有着鲜明的促进整体性发展的效能。要实施整体性发展,就必然要求推行协商民主,因为整体性发展的核心要素或内在的统领性要素是整体利益,这种整体利益把不同的群体统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促进整体性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正是这种整体利益,才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换言之,由于存在着根本的整体利益,因而大家才有必要心平气和、采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民主协商。如果说整体性发展是协商民主的实践载体,它对协商民主起着支配性作用的话,那么,协商民主也对整体性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在整体发展观看来,协商民主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协商民主是实现社会成员或发展主体广泛而有序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如何广泛动员众多的发展主体积极投入到社会发展进程中以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显然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协商民主正是这一制度安排的理想形式。通过协商民主的做法,广大发展主体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对话、沟通、讨论、审议等方式,就社会发展的决策表达意见和建议,行使发展参与的权利,正常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发展利益和愿望,进而有效化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发展的高效和有序。其二,协商民主是实现社会发展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对整体性发展而言,倡导协商民主就是要实现发展决策的民主化。在发展实践中,通过协商民主,中央政府可以广泛听取民意,集思广益,兼容吸收各方面有价值、可操作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平衡各方利益,制定出充分反映人民意志和各方合理要求的方针、政策,实现发展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使社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更加具有整体性。

在整体性发展的上述做法中,顶层设计是灵魂,统筹兼顾是具体做法,协商民主是制度保障,它们的协调统一,必将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整体性发展。

■ 《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约14000字